

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1950-1954)

周琇環

摘 要

1950 年 10 月起，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後，與聯軍主要接戰 5 次，五次戰役下來，聯軍俘獲華籍戰俘約 2 萬 1 千餘人。最初他們被收容在釜山收容所，後來遷往巨濟島，分為七二與八六聯隊。此時戰俘營發生反共與親共的爭執，因為約 7,000 人的親共戰俘屈居下風，聯軍乃將其另外安置於六二聯隊。其餘約 14,000 人的華籍戰俘是反共的，他們堅決反對遣返至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以「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滅共匪」的志願，選擇來臺定居，這就是所謂「韓戰反共義士」。後來，受韓戰反共義士影響，陸續投奔來臺有 17 萬餘人的大陸人士，則沿用其名稱，為後世統稱為「反共義士」。文章所稱「反共義士」乙辭，最早是根據 1953 年 8 月 6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之「宣傳通報第二十七號」規定而來，其後中央即通令所有宣傳單位，統一稱呼。

本文引用的史料，檔案方面包括國防部藏《國防部檔案》、國史館、外交部藏《外交部檔案》；當事人的回憶方面，有駐韓前後任大使邵毓麟、王東原的回憶錄、負責組織策反工作的陳建中的紀念集；工作報告方面有負責接運的賴名湯、負責安置的蔣經國等人的報告，全文並參考當時的報章雜誌及今人的研究而完成。

此外，本文所關心的問題，如接運義士來臺的經過及如何安置等，是過去研究未曾討論過的。所以文章以一、反共義士的由來；二、援助韓戰反共義士運動，包括心戰指導小組的設立、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行動二項；三、接運義士來臺經過與來臺義士人數的問題；四、義士的安置；五、

自由日運動與義士來臺的影響等五節，說明接運前中華民國政府派黨工赴戰俘營運作組織反共力量的工作，又運用黨政軍機構號召，結合民間團體，支持援助反共義士運動情形；再者說明接運反共義士來臺的經過，深入探討來臺義士總人數、出身、中華民國官員赴韓接洽接經過、美艦飛機的護衛下反共義士駛向臺灣的運送過程；最後討論義士來臺後所達到的宣傳效果、政府對義士的安置與其來臺對社會人心的影響等。

關鍵字：反共義士、陳建中、蔣經國、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

A Study on the Transport of Anti-communist Fighters to Taiwan during the Korean War (1950-1954)

Hsiu-Huan Chou^{*}

Abstract

Starting in October 1950, Chinese People's Volunteers swarmed into the Korean battlefield to join the fight against the Union Army. After five battles, the total number of Chinese war prisoners was around 21,000. These war prisoners were first put at the Pusan shelter. But they later were moved to the shelter on the island of Oedo and were split into two compounds, the 72nd and the 86th. Due to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these war prisoners could not get along with each other. Some supported the communists (the pro-communists) and some against them. About 7000 war prisoners were pro-communists and they were put in the 62nd compound. The remaining 14,000 war prisoners were anti-communist. These prisoners firmly refused to be sent back to the Communist China and chose to settle down in Taiwan. Their slogan was "to return to Taiwan whole-heartedly, and to destroy the communists with all their lives." These people were the so-called "Anti-communist Fighters of the Korean War." Their influence was far-reaching because later on there were more than 170,000 mainlanders seeking political refuge in Taiwan. They were the so-called "Anti-communist Fighters." The term "Anti-communist Fighters"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27th propaganda" of the KMT Central Committee, which was published on August 6th, 1953. The term was formally acknowledg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aiwan shortly afterwards and became widely used.

The archives referred to in this paper include Archives of National Defense, Archives of Foreign Ministry, documents collected at Academia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Historica, memoirs of Shao Yu-lin and Wang Tung-yuan (Taiwan's Ambassadors to Korea) and many other reports and papers written by people in charge of the matter, including Chen Chien-chung, Lai Ming-tang, Chiang Ching-kuo, etc.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ing the anti-communist fighters back to Taiwan and their placement. This is a point that has never been touched upon before.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discussed in five sections in this paper: (1) the origination of the term, "Anti-communist Fighters," (2) the supports for the anti-communist fighters,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sychological Warfare and the activities of other supporting committees, (3)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ing anti-communist fighters to Taiwan and the number of the fighters, (4) the relocation of the fighters, (5) the movement of the Freedom Da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fighters in Taiwan. In other word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ent her party members to Korea to organize anti-communist workforce before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fighters. Furthermore, supports for the fighters came from diverse source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the KMT party, the military forces, and civilian organizations. There i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official negotiation of the KMT government in Korea, the process of transport, the number and status of the fighters, the help from the USA, the arrival and relocation of the fighters in Taiwan,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Keywords: Anti-communist Fighter, Chen Chien-chung, Chiang Ching-kuo, Supportive Committees, the Employment Counsel for Anti-communist Fighters

接運韓戰反共義士來臺之研究 (1950-1954) *

周琇環**

壹、前言

1950 年 10 月起，中國人民志願軍進入朝鮮後，與聯軍主要接戰 5 次，5 次戰役下來，聯軍俘獲華籍戰俘約 2 萬 1 千餘人。最初他們被收容於釜山收容所，後遷往巨濟島，分爲七二與八六聯隊，此時戰俘營發生反共與親共的爭執，約 7,000 人的親共戰俘屈居下風，因此將其安置於六二聯隊。¹ 約 1 萬 4 千人的反共戰俘，堅決反對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決定以「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滅共匪」的志願，選擇來臺定居，是所謂「韓戰反共義士」。後來受韓戰反共義士影響陸續投奔來臺的 17 萬餘大陸人士，則沿用其名稱，統稱爲「反共義士」。

至於韓戰反共義士來臺的日子，一般人多誤以爲是「一二三自由日」，事實上除了 142 名不能坐船的傷病義士，確實在 1954 年 1 月 23 日搭乘飛機抵達臺北，14,078 名絕大多數的義士是在 25 至 27 日坐船至基隆港來臺的，「一二三自由日」則是全體反共義士恢復自由取得平民身分的日子。

本文所謂「韓戰反共義士」，是有根據的，但並不是根據約定俗成、想當然爾的原因，至於其訂定的根據究竟爲何？本文將予說明。並且我們也關心義士來臺的經過及如何安置等問題，所以本文將以反共義士的由來、援助韓戰反共義士運動、接運義士來臺經過與來臺義士人數的問題、義士的安置、自由日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11 年 1 月 3 日；通過刊登日期：2011 年 6 月 7 日。

** 國史館協修

¹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7 年 7 月），頁 6。

運動與義士來臺的影響等五節，說明反共義士來臺的關鍵因素，並深入討論來臺義士總人數究竟是多少？其身分、年齡、籍貫、教育程度、職業情形各為何？中華民國官員赴韓接洽接運義士的經過如何？1954 年 1 月 21 日義士全部啓航，駛出仁川港，在美艦飛機的護衛下駛向臺灣，並於 25 日至 27 日分批抵達基隆港的運送過程如何？以及義士來臺後所達到的宣傳效果、政府對義士的安置與其來臺對社會人心的影響等議題。

至於本文所引用的史料，檔案方面包括國防部藏《國防部檔案》、國史館、外交部藏《外交部檔案》；當事人的回憶方面，有駐韓前後任大使邵毓麟、王東原的回憶錄，負責組織策反工作的陳建中的紀念集；工作報告方面有負責接運的賴名湯、負責安置的蔣經國等人的報告，全文並參考了當時的報章雜誌及今人的研究而完成。

貳、反共義士的由來

1950 年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第二天美國即對北韓採取行動，以海空軍支援南韓部隊。9 月 15 日，美軍於仁川登陸，將北韓軍隊逼回 38 度線以北。10 月 8 日，毛澤東任命彭德懷為「中國人民志願軍」（以下簡稱志願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9 日，志願軍主力部隊渡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場。25 日，與南韓及美國軍隊交戰，開始了第一次戰役。² 中共志願軍入朝鮮後 8 個月間，即 1950 年 10 月至翌年 6 月，與聯軍共接觸 5 次，其主要戰役略述如下。

抗美援朝的第一次戰役是在 1950 年 10 月 25 日開打，是日，南韓軍闖進志願軍第四〇軍集結的溫井地區，四〇軍在兩水洞的公路兩邊發起突襲，將南韓軍全殲，這一天後來就被定為抗美援朝戰爭紀念日。11 月 7 日，在東線黃草嶺擔負阻擊任務的志願軍第四二軍和朝鮮人民軍一部在抗擊過美軍陸戰第一師的進攻後，開始向北後撤，第一次戰役結束。志願軍使用兵力為二九軍全軍、

² 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187-191、204-205；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頁 117。

三八軍及四二軍之一部，³ 此次戰役被稱為「遭遇與反突擊戰役」，共進行了 13 天，志願軍以 1 萬餘人傷亡的代價，消滅了聯軍 1.5 萬人，大部分是南韓軍。⁴

從 1950 年 11 月 25 日至 12 月 24 日，志願軍進行了第二次戰役。實際上第一次戰役和第二次戰役中間，嚴格來說戰鬥並無間歇，雙方一直進行前沿接觸戰。11 月 24 日，聯軍統帥麥克阿瑟宣布開始發動「聖誕節前結束戰爭的總攻勢」，25 日黃昏，志願軍西線部隊發起進攻。此次戰役動用兵力為三八、三九、四〇、四二、五〇、六〇共 6 個軍，以排山倒海之勢，猛撲聯軍後方，是為「剪刀戰術」，⁵ 西線聯軍於 12 月 4 日下令放棄平壤，一直向 38 度線退却。總計西線戰鬥美軍近 3,000 人被俘，是朝鮮戰爭中俘虜美軍最多的一次。12 月 12 日東線美軍衝出包圍，以後，第十軍全部撤入咸興和興南港，24 日全部從海上撤往南韓。至此第二次戰役以收復北韓而告結束。第二次戰役中志願軍作戰傷亡 3.07 萬人，據中國北朝鮮（以下簡稱中朝）的統計，聯軍方面損失 3.6 萬人，其中美軍 2.4 萬人（美方統計損失 1.7 萬人）。美軍 10 天內退却了 300 公里以上，此戰役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戰局。⁶

根據毛澤東的決定，1950 年 12 月 31 日至 1951 年 1 月 8 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和朝鮮人民軍聯合發起了第三次戰役。事實上，志願軍司令部於 12 月 15 日即確定第三次戰役的部署，決心出動 9 個軍，以 5 個軍在西線向漢城方向進行主要突擊，以 4 個軍在東線作輔助性突擊。12 月 31 日，志願軍在西線向敵 38 度線發起全線進攻。1951 年 1 月 4 日，志願軍及朝鮮人民軍進入漢城，1 月 8 日，人民軍占領仁川，中朝部隊全線進抵 37 度線，彭德懷鑒於供應困難下令

³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民國 77 年 6 月），頁 10。

⁴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頁 57-165，由於徐焰引用 FRUS、《艾奇遜回憶錄》、《杜魯門回憶錄》、《毛澤東軍事文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彭德懷軍事文選》、軍事科學院軍史部著《抗美援朝戰爭史》等許多中美雙方的資料，故本文關於 5 次戰役的記載，主要以徐書為根據；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刷），頁 27-33，但本書第一次戰役結束日，作「5 日」。

⁵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1。

⁶ 杜平（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主任），《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 2 月 2 刷），頁 91-98、148；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頁 166、168、170、173、175。

停止追擊，就此結束了第三次戰役。此次戰役中，據中朝方面統計共殲敵 1.9 萬人，其中絕大部分是南韓軍。中朝軍隊傷亡 0.85 萬人，其中志願軍傷亡 0.58 萬人。⁷

第三次戰役結束，中朝軍隊正準備休整兩個月，再發動春季攻勢，聯軍卻倚仗主力完整和補充迅速，展開了反攻，使中朝兩軍自 1951 年 1 月 25 日至 4 月 21 日進行了第四次戰役，主要是聯軍反攻，中朝採取機動防禦作戰。聯軍分東、中、西三線進軍，西線戰事最烈。4 月 21 日，戰役結束。本次戰役歷時 87 天，聯軍一直向北發起猛烈進攻，但只前進了 100 餘公里，據中方統計，戰役期間共殲滅聯軍 7.8 萬人，其中俘虜美軍約 1,200 人、南韓軍 7,800 人。中朝軍隊共損失 5.3 萬人，其中志願軍傷亡 4.2 萬人、失蹤 4,379 人。⁸ 第四次戰役期間，在 4 月 11 日發生麥克阿瑟突被杜魯門以公開廣播方式的解職事件，美國政府此舉主要是在防止戰事擴大，避免演成第三次世界大戰。⁹

當聯軍再次進抵 38 度線時，中朝軍隊於 1951 年 4 月 22 日至 6 月 10 日進行了第五次戰役。中朝軍在 38 度線附近樺川湖之南，以「人海戰術」猛攻聯軍陣地，中共動用的兵力是第二〇、二七、三九、四二、五〇、六〇等共 6 個軍，依舊採「剪刀戰術」，企圖一舉而下漢城。此役聯軍布下袋形陣勢，誘敵深入，共軍第六〇軍的戰力消失，第一八〇師全師覆沒。聯軍的俘虜收容站，擠滿了共軍的投降士兵。¹⁰ 第五次戰役歷時 50 天，據中朝方面統計，共殲滅聯軍 8.2 萬人，共方損失 8.5 萬人，其中志願軍損失 7.5 萬人，特別是在戰役後一階段，部隊在後撤中 2 萬人失蹤。美方則宣稱在 5 月下旬俘虜中方 1.7 萬人，這一數字占韓戰中志願軍被俘人員總數的 80% 以上，損失慘重。¹¹ 是年 6 月 4 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說明第五次戰役的不利情況，13 日，史達林表示「現在

⁷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頁 185-188。

⁸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頁 197、206-207；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1。

⁹ 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 (NY: The Free Press, 1975), p. 197.

¹⁰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1-12。

¹¹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頁 208、217。

停戰是件好事」，於是中蘇開始考慮停戰談判的問題。¹²

5 次戰役下來，聯軍俘獲中朝戰俘人數達 173,700 餘人，其中華籍戰俘占了 21,300 人（第一次戰役俘虜約 500 人，第二次 800 人，第三次 2,500 人，第四次 9,000 人，第五次約 8,500 人）。¹³ 這些戰俘中，有戰敗被俘，也有陣前投降者，至於為何共軍有大規模投降的現象？根據《新生報》的說法，原因有：一、志願軍中大多數是國軍舊部。¹⁴ 二、這些在韓作戰的共軍，生活上是痛苦的，總是作夜間急行軍以避聯軍空襲，捨坦途就山嶺，捨軍船而步行，以免被發現行踪，加上聯軍向他們喊話有飯吃，便有千餘共軍投降。三、大陸共軍人心思漢，歡迎中華民國國軍。¹⁵

聯軍將俘獲的戰俘，陸續送往釜山收容所。在收容所，聯軍依國際戰爭法與日內瓦公約規定，未將戰俘分別隔離，華籍與北韓戰俘是同居雜處的。後因華籍與韓籍衝突，而區分開來，分別管理，其後果則是華籍戰俘間又開始有親共反共的衝突。第四次戰役後，共軍人海戰術下，被聯軍俘獲的戰俘大增，釜山收容所營房不夠分配，而決定遷往巨濟島。¹⁶ 1951 年 5 月 30 日，移至巨濟島，華籍戰俘多被安置在七二與八六聯隊當中。此時，在戰俘營中發生反共與親共的爭執。1952 年 2 月 27 日，美國在志願遣俘原則確立後，4 月 8 日，透過甄別（screening）行動對戰俘進行分類，以便區別願遣返與不願遣返之戰俘。¹⁷

¹² 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2010 年 6 月），頁 52-53。

¹³ 以上統計資料係根據臺北榮家室史室統計圖；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0-12。

¹⁴ 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的調查，義士的職業，以軍人最多，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 9,234 人，占義士總人數的 66%。參見「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7。

¹⁵ 〈由匪俘論制匪之道〉，《新生報》，民國 40 年 6 月 2 日，版 2；〈投誠義士嚮往祖國〉，《新生報》，民國 40 年 7 月 3 日，版 3；〈炒麵大禍不可收拾，「志願軍」志願投降〉，《新生報》，民國 40 年 7 月 16 日，版 2。

¹⁶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臺北：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民國 44 年 1 月初版），頁 18-23。

¹⁷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94-97；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2；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民國 97 年），

其中的反共戰俘約 1 萬 4 千餘人，他們堅決拒絕返回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決定來臺定居，是所謂「韓戰反共義士」。4 月 13 日，甄別工作結束，通知遷往濟州島的莫瑟浦。¹⁸

各界對「反共義士」的稱呼不一，有稱為「匪俘」、「反共華籍戰俘」、「來臺志願軍戰俘」、「反共同胞們」等。直至 1953 年 8 月 6 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擬定之「宣傳通報第二十七號」，有謂：

總統已於七月三十日對他們發表文告，加以慰勉，堅定其意志。我各界人民團體、各機關校，應繼起書寫慰問書，予以熱烈的鼓勵，我言論界亦宜有所表示，並希依下述要點，各就立場，以不同的語氣，寫出富於情感和充分歡迎慰問書及言論：一、對他們的稱呼，可稱「親愛的反共同胞們」、或「可敬愛的反共義士」或「反共的戰士」、「親愛的同胞」等，愈親切愈佳。¹⁹

因是所謂「反共義士」的名稱，係經中央決議，通令所有宣傳單位統一稱呼而來。²⁰

以上說法，證諸今人研究是可信的，沈幸儀推斷說：「『反共義士』一詞的出現，要到 1953 年 8 月到 9 月間，此時談判確定成局，解釋活動正要開始。國內各大報如《中央日報》、《聯合報》等，皆以『反共義士』來稱呼不願遣返的戰俘。」反共義士一詞的意味，則是「此時的『反共義士』比起過去的『匪俘』，開始由『可憐悲慘』的俘虜變成『英勇不屈』的英雄。」²¹

反共義士的志願誠如上述，但實際上美國、聯軍、中華民國、中共的態度如何，才是真正決定他們去留命運的關鍵。當時美國、中華民國及聯合國的政策與決議，及共產國家的外交對抗，在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

頁 79、93；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頁 59-60。

¹⁸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105。

¹⁹ 周琬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臺北：國史館，民國 94 年 5 月），頁 164。

²⁰ 「對留韓反共志士來臺處理方案的意見」，〈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700060103。

²¹ 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頁 160。

（1950-1953）》，《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已有詳細闡述。以下僅簡要說明事件的關鍵因素。

1952 年 2 月 27 日，杜魯門總統與國務院、國防部、財政部官員會議後，作出最後的決議，就是美國不同意「強迫遣俘」，以「志願遣俘」當作美國「最終政策」，並指示國務院與國防部令聯軍統帥李奇威將軍在停戰談判中執行。²² 同日，中華民國外交部長葉公超代表臺灣政府向美聯社發表談話，表示中華民國歡迎反共戰俘來臺，稱：

中華民國政府準備接收所有志願來臺參加反共抗俄工作之韓境中國戰俘，惟彼等之意向，必須先經聯合國統帥部（又稱聯軍總司令部、總部，以下皆以聯軍統帥部稱之）查明屬實。中華民國政府此項決定，係外交部葉部長本日向美聯社透露；並曾經蔣總統中國政府高級首長對其詳為檢討後始行宣布。此項決定非因聯合國統帥部曾向中國政府有所接洽而引起，實係中國政府之自動抉擇，因此事早經長期研究。²³

1953 年 3 月 5 日史達林因腦溢血去世，蘇俄即積極展開其和平攻勢。²⁴ 4 月 26 日，共方與聯軍於板門店復會和談，共方首席代表南日與聯軍首席代表哈里遜中將（William K. Harrison）開始折衝商討。²⁵ 6 月 8 日簽訂換俘協定，具體採納志願遣俘原則，規定由瑞士、瑞典、波蘭、捷克、印度五國代表組成，成立「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其中由印度代表為主席兼執行人。7 月 27 日簽字的「韓境停戰協定」即包括此項換俘協定在內。²⁶ 於是決定採納志願遣俘原則，

²²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XV, Korea, Part I, pp. 68-69.

²³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外交部印行，民國 43 年 10 月 20 日），頁 6-7。

²⁴ 「宣慰韓戰反共戰俘參考資料」（42 年 8 月 15 日），〈在韓中共俘虜〉，《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外交部藏，檔號：633.43/005。

²⁵ 「韓戰和談參考資料」（民國 42 年 7 月 28 日），《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頁 59；韓戰和談自民國 41 年 10 月 8 日起無限期休會，參見「宣慰韓戰反共戰俘參考資料」（42 年 8 月 15 日），〈在韓中共俘虜〉，《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外交部藏，檔號：633.43/005。

²⁶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頁 17；「宣慰韓戰反共戰俘參考資料」（42 年 8 月 15 日），〈在韓中共俘虜〉，《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外交部藏，檔號：633.43/

並成為新的國際法原則。

根據停戰協定規定，應於簽字後 60 天內（即 1953 年 9 月 27 日）交由中立國遣返委員會接管，義士們由莫瑟浦遷至統營里，開始解釋工作，90 天內（即同年 12 月 22 日）完成解釋，之後不遣返的戰俘，將在另外 30 天內召開之政治會議決定他們的命運。但實際解釋工作延至 10 月 16 日才開始，後又因設備建設、戰俘反抗，共軍數度中斷解釋的進行。政治會議且於 26 日召開，12 月 12 日聯軍片面中斷會議，沒有達成任何協議。聯軍統帥部重申，解釋期限必須依停戰協定的規定在 12 月 23 日午夜告終，解釋工作於是日正式結束。1954 年 1 月 14 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向聯軍統帥部要求，提前在 20 日將戰俘移交給原拘留的雙方，16 日聯軍覆函同意提前辦理，於是 20 日反共義士開始離開戰俘營，準備依其志願遣送臺灣。²⁷

叁、援助韓戰反共義士運動

反共義士的來臺志願，除了受美國政府的主張影響，中華民國或明或暗的支持，更是關鍵因素。中華民國曾配合黨政軍力量，發起一項援助反共義士運動，這運動，一面在戰俘營中組織策反工作，另一面為廣事宣傳，號召民間加入的慰問活動，以支援義士的來臺行動。

一、心戰「指導小組」的設立

策反組織工作方面，1950 年 11 月至 1951 年 3 月間，美國第八軍成立心戰組，使韓戰除武力戰之外，又多一項「喊話」攻勢。此攻勢下，有用傳單來宣傳、有用口來喊話，是一種新發動的心理戰。主持心戰的是美國人林巴格教授，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也曾盡力幫忙，因為實際工作人員，多是中國人。1951

005。

²⁷ 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頁 78-81；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152、164。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的主席是印度，統營里的俘虜營由印度軍監管，因此又稱為「印度村」。

年 2 月 15 日，在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協助下，考取略通英語或日語之華僑中小學教師及學生 14 人，前往大邱，予以短期訓練後，分發各部擔任翻譯及心戰工作，成為心戰戰士。駐日盟軍總部並曾與中華民國政府洽妥由臺灣派 40 人前往韓國協助心戰。以後陸續考選人員，加入工作。而在幕後指揮這批心戰士兵的，是駐韓大使邵毓麟自兼「中國心戰部指揮官」。²⁸

1951 年 6 月 23 日聯軍與共軍正膠著在 38 度線之間，也正是志願軍發動第五次戰役失敗以後，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Jacob Malik），發表廣播演講，提議韓戰雙方言和。聯合國代表們也呼應其主張，這樣產生了開城會議，導引板門店談判。當開城會議開始之前，戰俘營中各大隊裏已瀰漫著不安情緒，七二聯隊決心自己去創造自己的命運，而不是由聯軍決定。6 月 27 日李大安等人商議，最後決定回到臺灣去，並喝血酒以決志。7 月 2 日，印汝亮等人上第一封血書給蔣中正總統、李奇威將軍、杜魯門總統、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及到韓國前線來慰勞的紐約區紅衣主教史培爾曼（Cardinal Spellman）。7 月 5 日美國陸軍心戰處處長麥克盧爾將軍，提出准許反共義士前往臺灣的建議。²⁹

1952 年 2 月 21 日，國防部電告外交部，經考察確實志願來臺者，可以一律接收來臺。25 日，外交部部長葉公超覆美聯社提問，表示考查屬實之投誠匪俘，可接收來臺，³⁰ 對外清楚表達中華民國的最後決策。

艾森豪當選為美國總統後，1953 年 2 月 2 日，送國會的國情咨文中，宣布終止「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暗示鼓勵中華民國政府反攻大陸，開闢第二戰線，牽制韓國戰場的中共部隊，藉以迫使中共同意韓戰停戰。3 月 5 日，俄酋史達林去世，國際共黨，群龍無首。原本因為韓戰戰俘遣送問題，聯軍主張「自由遣俘」，共黨主張「強迫遣俘」，以致停戰談判，僵持不下，如今在中止半年後，情勢有了變化，共黨遭遇被迫停戰的壓力日鉅，於是停戰呼聲，又甚囂塵上。

1953 年 3 月初旬，蔣中正總統在他主持的外交宣傳會報席上，討論韓戰停

²⁸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年），頁 249-251。

²⁹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30、33、36-38；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頁 53-53、56。

³⁰ 拙著，〈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頁 63。

戰的利弊及如何避免對我不利。邵毓麟以國策顧問名義出席，並提議妥為運用戰俘問題。會報結束後，邵向蔣單獨報告，謂：（在他任駐韓大使任內）

曾於戰爭爆發後，應美國及聯軍當局之請，選派我國旅韓僑校青年師生，參加聯軍對匪心理作戰審問戰俘的翻譯工作。以後由於共軍戰俘人數增加，聯軍需求中國譯員人數亦隨之增加，除僑校師生 60 餘人出任譯員，……其餘由聯軍從臺灣、香港、日本各地選拔遴用的中國譯員，我們中國大使館都有名單，儘量和他們取得聯繫。如果能夠在連繫中，加以適宜的組織工作，由組織譯員進而組織中共戰俘，再進而組織反共戰俘，那我們在自由遣俘問題上自有掌握運用餘地，……這種謀略運用，再配合外交工作，與韓政府密取諒解，……必能獲得最後勝利。

蔣本欲將這件負責策反組織的工作交邵毓麟進行，但邵認為「這是一件不可公開的秘密工作」，而他於 1949 至 1951 年間曾任駐韓大使，認識他的人太多，不適宜再去韓國前方，拋頭露面，引起中韓國際注意。邵與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商議此事時，認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簡稱中六組』副主任）陳建中同志，幹練沉著，富有對匪鬥爭經驗」，主張派陳前往韓國負責實際策反組織工作。取得經國先生同意後，再向蔣中正報告，而決議派陳赴韓。³¹

1953 年春，陳建中為避免各方注意，採取秘密方式，以中華民國陸軍副武官身分為掩護，化名「陳志清」，前往設在釜山的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成立「指導小組」，就近有計畫的策動巨濟、濟州島戰俘營中傾向我方戰俘，逐步形成組織，並予有力支援。這小組包括王東原大使、陳建中、卓獻書，及駐韓武官，與兩三位地下工作人員，以後更有以記者身分前往的黎世芬、林徵祁、魏景蒙等人。³² 王東原大使囑令卓獻書秘書將各項進行工作，連同名冊，交由

³¹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96、324、339、351-354。1953 年 5 月，陳建中調任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引自李白虹，〈他寫下了心理戰場上的光輝史頁〉，《彩繪人生八十年——陳建中先生八秩華誕文集》（臺北：日本研究雜誌社，民國 81 年 11 月），頁 182。邵毓麟於 1949 年 1 月 17 日奉派為首任駐韓大使，7 月正式就職，1951 年 9 月政府正式公布其辭職事，轉任國策顧問。

³² 劉侃如，〈「陳志清」的故事〉，《彩繪人生八十年——陳建中先生八秩華誕文集》，頁 232。

陳建中主持管理，並令大使館全力協助。³³ 到韓國兩個半月後，中共的電台，竟已廣播「國民黨派了特務陳○○赴韓勾結李承晚，策劃強迫扣留中韓戰俘」，換言之，短期內中共已有警覺，陳建中在此一時期的工作，則極為艱困。加以當時聯軍已將反共華籍戰俘，遷移到濟州島南端的慕瑟浦，駐有大批軍憲嚴密管制，頗難接近，相反地，中共所派紅十字會代表團，經聯軍許可，准其前往，以故我方心戰工作，乃分下列四階段進行：³⁴

第一階段，因為當時中共戰俘約 1 萬 5 千人，被分為三個支隊。支隊之下，再分大隊、中隊、分隊，由聯軍以重重鐵絲網圍繞，分若干個營房，隔別看管，本階段第一項工作即為全力設法溝通與戰俘的直接關係。第二項是團結戰俘，使他們自動表示堅拒遣返大陸，要求返回臺灣。第三項是爭取華籍及韓籍譯員，協助進行聯繫及指導工作，藉以溝通戰俘意志。

第二階段，陳建中曾秘密親赴慕瑟浦會見反共戰俘領袖，指導其工作方針，後來在戰俘營正式建立組織。隨後又進行調查中共間諜在戰俘中的活動、與聯軍心戰部門取得聯繫、與韓國政府相互連絡、注意適當宣傳與聯軍新聞界聯繫等工作。

第三階段，由於我方努力工作，反共戰俘堅決反對重返匪區，甚至絕食、刺血、遊行示威，一般戰俘反共態度，因之極為堅定。釜山戰俘 300 餘人，甚且實施突營，全部逃出。繼之，李承晚大統領亦於 1953 年 6 月 18 日，下令釋放韓籍戰俘 2 萬 5 千人，各方震動，舉世矚目。美方鑒於情勢嚴重，最後不得不求助我方，並派員赴臺晉謁蔣中正總統，請求我方宣撫反共戰俘與聯軍合作，聯軍保證尊重「志願遣俘」原則。自由中國朝野曾先後派遣兩個代表團赴韓，一為由倪文亞率領的各界慰問團，另一則由方治率領，運送慰勞物資給反共戰俘。1953 年 11 月，李承晚訪問臺北，在中韓元首聯合公報中，關於遣俘問題，曾共同保證貫徹自由遣俘原則。反共戰俘於接受蔣中正總統勸諭後，乃遵照國際決議，北上至 38 度線的中立區，由印度軍監管。

第四階段，聯軍接受五國中立國委員會要求，准由中共派員向反共戰俘進

³³ 王東原，〈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傳記文學》，第 52 卷 1 期（民國 77 年元月），頁 22。

³⁴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354。

行「解釋」。共軍透過中立國協助，「解釋」下的洗腦工作，却無所成就。全部反共義士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獲得自由，25 至 27 日返抵臺灣。³⁵

由以上的各工作階段來看，可以說是因為透過陳建中所負責的策反組織工作，透過中國譯員取得與戰俘直接接觸機會，親見反共戰俘領袖，並指導其工作方針，在戰俘營裏建立起反共組織，來促成反共義士們結合一氣，加上聯軍的支持，終於使反共義士能以抵臺。

二、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行動

慰問宣傳活動方面，由於中外電訊和報章雜誌，不斷地報導反共義士的事蹟，因此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以下簡稱救總）³⁶，決定以最大的努力援助反共義士的來臺。1953 年 6 月李承晚大總統下令釋俘後，有費玉琳等 66 名義士逃匿旅韓僑胞家中，獲得庇護，該會聞訊即撥匯新臺幣 10 萬元濟助他們，同時決定由該會發起「援助留韓反共義士運動」。8 月 26 日，救總秘書長方治率慰問團赴韓慰問義士，歸途道經日本，經聯軍統帥部的同意，把這批義士先行運來臺，除有 3 人，因事滯韓，10 月 8 日，費玉琳等 63 名義士，由韓乘專機飛臺。³⁷

救總秘書長方治率團赴韓慰問義士之行，係由谷正綱理事長及各常務理監事商籌組織之「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慰問留韓反共義士代表團」而來。救總推常務理事兼秘書長方治為團長，邀軍人之友社總幹事江海東、僑務委員會委員甘澤、英文中國日報社社長魏景蒙、救總專員李善芳等四人，組織慰問團。1953 年 8 月 26 日，由空軍總部派巨型運輸機 11 架，載運慰勞品 37 噸，飛往韓國濟州島莫瑟浦聯軍戰俘營，實地慰問反共義士。³⁸

³⁵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355-356。

³⁶ 該會於 1950 年 4 月 4 日，由中國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等各政黨，及農工商學暨宗教、婦女等各界人士，以及國際友人，響應蔣中正總統救濟大陸流亡災胞之號召而成立。《反共義士》（臺北：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印行，民國 43 年 1 月），頁 15。

³⁷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25-26。

³⁸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31-34；中華民國各界援助

當慰問團到達濟州島時，適逢韓境停戰協定簽字不久。依協定的規定，中韓反共義士均須遷往中立區，在印度軍隊的監管下，接受為期 90 天的共方解釋，和此後 30 天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監管。義士們正當憂心前途、惶惑不安之際，蔣中正總統的廣播，慰問團的恰巧來訪，安定了軍心，而與聯軍統帥部合作。也由於救總慰問團的歸來，決定展開一項經常、有組織、有計畫的援助義士工作。³⁹

1953 年 9 月 8 日，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張炎元召開「援救韓境中國反共義士工作方案座談會」，會中決議其援助工作分為宣傳、慰勞、鬥爭策略三者。國內宣傳由中央委員會第四組主辦，第三、五、六組、國防部總政治部、大陸災胞救濟總會協助；國外宣傳由中央委員會第三組負責；慰勞部分由中央委員會第五組會同救總負責，第四、六組、國防部總政治部、外交部、教育部、教育廳等協助之；鬥爭策略部分，由總統府資料組主辦，第六組協助。⁴⁰中央委員會在慰勞工作上，決議發動全國性省級及臺北市所有人民團體、各民意機關、各省市同鄉會、各大中小學校等，於日內召開自由中國各界籌備救援留韓反共義士返回臺灣大會，大會應籌組一救援反共義士後援會，負責辦理勸募及籌備歡迎事宜。⁴¹

於是 9 月 12 日由救總召集了援助留韓反共義士運動的籌備會，會中確定援助機構之名稱為「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以下簡稱「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⁴²推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運動的機構，以中央委員會第三、四、五、六組、內政部、外交部、總政治部、臺灣省黨部、社會處、教育廳、新聞處、救總、軍人友總社等有關單位，組織指導小組，負推行本運

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編者印，民國 43 年 5 月），頁 1。

³⁹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1-2；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39-41。

⁴⁰ 周琇環編，〈討論援救韓境中國反共義士工作方案座談會紀錄〉，《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頁 485-486。

⁴¹ 周琇環編，〈援救韓境中國反共義士工作方案〉，《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頁 490-491。

⁴² 周琇環編，〈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籌備會議紀錄〉，《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頁 407-409。

動決策之責，並以中央委員會第四、五、六組為召集人。由救總秉承指導小組之決策，全面發動並主持本運動。⁴³ 援助義士工作，從此有了一綜合的中心組織。發起時共 176 個團體參加，後來增加至 448 單位，這些團體的參與，一方面與執政者透過各種國民黨分支黨部、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婦女會、軍人之友社等組織所從事的動員工作，有密切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有自發的。參加的單位包括農、公、商、青年、婦女、自由職業、宗教文化團體，以及各地旅臺同鄉會與省縣市的民意機構等。⁴⁴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成立於 9 月 26 日，當時中華民國各界 448 個團體代表 3 千餘人，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大會」，大會由救總、軍人之友社、中華婦女反共抗俄聯合會等 31 個籌備委員單位負責人為主席團，總主席由谷正綱擔任。成立大會上總主席谷正綱理事長說明發起援助義士運動的三個目的：

- (一) 呼籲聯軍統帥部堅持志願遣俘原則，保證義士在監管期間，不受到安全和自由的威脅，及呼籲全世界民主自由國家與人士，予義士以正義的同情與支持。
- (二) 援助留韓反共義士，使他們堅定反共意志，發揚民族氣節，打破「共匪」所謂「洗腦」的陰謀。
- (三) 歡迎留韓反共義士，在監管期滿以後，回到我們自由祖國來。

各界代表致辭後，決定要案如下：

- (一) 推定救總、軍人之友總社等 31 個重要團體為常務委員；
- (二) 發動 10 萬書信慰問反共義士。
- (三) 擴大勸募，採購慰問品，送往韓國中立區慰問義士。
- (四) 以大會名義揭發「共匪」六項洗腦陰謀，並抗議印軍沒收義士收音機。

⁴³ 「推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運動工作綱要草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600030013；「推動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運動工作綱要」〈民國 42 年 9 月 17 日〉，〈七屆中央委員會工作會議第 49 次會議紀錄〉，《會議紀錄》，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檔號：7.4/47-52。已根據審查人建議查閱過中央黨部的中常會紀錄等，但其檔案的內容與國防部檔案同。

⁴⁴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頁 649。

（五）以大量報紙按日份寄韓國中立區（供）義士閱讀。⁴⁵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由委員大會推選 31 個單位擔任常務委員組成之，在委員會大會閉會期間，由常務委員會代行其職權，為便於處理日常會務，在常務委員會下設總幹事 1 名，由救總人員擔任，副總幹事 2 名由臺灣省臨時省議會、中華民國軍人友社總社人員擔任。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經費支用有二：一是業務費，就是專門用之於義士慰勞、服務等費；一是事務費，就是為辦理援助義士運動所需的各種辦宣傳及舉行各項會議等的費用。總計該會向各界勸募之經費，共計二次，第一次為擴大慰問義士運送韓國用，募得新臺幣 1,678,889.2 元；第二次募款在義士歸國之際，募得 908,805.6 元。⁴⁶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自成立以來，有援助義士工作情形，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工作：是援助義士獲得安全自由保障的階段。包括第一次委員大會的嚴正表示、10 萬民眾參加的反對印軍暴行大會、再接再厲的有力呼籲、國內宣傳的擴大實施、10 萬慰問書運動的熱烈展開、呼籲國際的重大反應、63 位義士歸國的接待盛況。

第二階段工作：是援助義士如期終止解釋的階段，包括第二委員大會的舉行、百萬民眾簽名的熱潮、尼克森、周以德的同情支持、國際呼籲的繼續進行、紅會慰問團的赴韓慰問。

第三階段工作：在援助義士如期恢復自由，包括第三次委員大會的召開、義士自由日運動的積極推行、海內外各界同胞的熱烈響應、赫爾統帥在臺的有力保證、自由鐘聲傳遍大地下的慶祝大會。

第四階段工作：是盛大歡迎慰問歸國義士，包括各界代表團於 1954 年 1 月 17 日飛韓迎接義士歸國、傷患義士的首批歸國、歡迎義士歸國的狂熱場面、各界熱烈慰問歸國義士、招待來臺訪問義士的外國記者團、歡迎被扣 7 義士歸國。

⁴⁵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2-3；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42。

⁴⁶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4-6。

第五階段工作：熱烈歡送義士入營並協助出國訪問。包括歡送首批歸國義士入營、歡送義士入營的空前盛況、協助義士出國訪問。⁴⁷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援助義士行動之外，各界對義士援助活動亦如火如荼地展開，初期活動主要包括簽名運動與照片展覽，其次是學生員警、工商界的捐款活動，1954 年 1 月 1 日甚至有臺灣大學教授沈剛伯、錢思亮等 95 人發表聯合宣言，10 餘天後，全國大專院校的學生在救國團的推動下，也響應此一運動，要求有關單位如期釋放拒絕遣返大陸的義士，這些大專學生接連幾天，舉辦青年座談會、民眾晚會、出版特刊壁報、演街頭劇，並以標語、漫畫等從事街頭宣傳。此外，司機工會、影劇界等也有類似的活動，支持義士的來臺。⁴⁸

雖說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名義上是民間團體組成，但發動者乃是黨政軍三者。援助義士運動之所以獲得良好績效，根據該會推論，援助義士運動一、對外係爭取國際同情與援助的運動，自發動以來，已在國際間引起極大的重視與同情；二、對內係愛國的民族運動，自發動以來，已在自由中國的軍民和海外僑胞間掀起熱烈響應高潮，各界同胞對慰問信及助募代金，均極熱烈響應，十萬慰問信不但足額發出，甚至有學生、戰士等迭次以血書向留韓反共義士慰問者；三、此一運動之推行，不但由於該會全體委員之努力，以及各有關單位之密切配合，故一切工作能順利展開，並獲得預期效果；四、對敵係強烈的政治鬥爭運動，反共義士的忠貞表現，即足證明政權崩潰的象徵。⁴⁹ 現在的中共政權不但未崩潰，更成為世界強權，因此除了第四點不符合後來現實國際政治的發展情況，其餘 3 點根據資料來看，所言甚是。

總之，反共義士投效臺灣中華民國的夢想，在政府與民間的支持下，更全面的展開了。

⁴⁷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8-37。

⁴⁸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649-651。

⁴⁹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15；「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兩個月來工作概況」（民國 42 年 11 月 25 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600090090。

肆、接運義士來臺經過與來臺義士的人數問題

1953年6月，在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成立前，趁韓國釋俘機會，衝出戰俘營，重獲自由63位義士，在救總的接濟下，於10月8日搭包機2架抵達臺北，⁵⁰是首批來臺的義士。

後來，根據韓境停戰協定，韓戰交戰雙方同意將不願直接遣返回國的戰俘，交由1953年9月9日成立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處理。至12月23日，終止解釋工作，同日，聯軍統帥赫爾（John E. Hull）上將宣布，將運用一切便利方式，於1954年1月間使1萬4千名華籍反共義士送往臺灣。⁵¹

因此，聯軍統帥部邀請中華民國政府派遣聯絡小組前往東京及漢城，協助聯軍統帥部辦理釋放中國反共義士有關事宜。1954年1月5日蔣總統命令國防部第二廳廳長賴名湯任組長，會同有關單位，選定軍官9人（文宗萬任副組長，管理小組江海東1人，後勤小組李搏鵬等4人，行政小組徐人雋等2人，外文秘書葛正道1人），組成「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以下簡稱「接運聯絡組」）（Chinese Government Liaison Team for the Reception of Chinese Non-repatriates in Korea，簡稱CGLT），其主要任務為：一、與聯軍統帥部保持密切連絡，並接洽有關義士返國之運輸、補給、醫藥及警衛等問題；二、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韓國接收該批反共義士返臺。⁵²

此外，外交部於1954年1月6日洽請聯軍統帥部協助預訂反共義士來臺

⁵⁰ 「外交部施政報告初稿」，〈工作計畫與報告〉（民國42年10月至43年1月），《外交部條約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3/1625-8；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13。

⁵¹ 〈遣返會昨決定終止解釋〉，《中央日報》，民國42年12月24日，版1；January 4, 1954 - Gen. John E. Hull, U.N. commander in Korea, stated that he would not accept any proposal aimed at keeping prisoners of war in neutral custody beyond Jan. 22, 1954. (source: The Britannica Archive) <http://www.britannica.com/facts/10/40906074/January-4-1954-Gen-John-E-Hull-U-N>；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83年），頁157。

⁵² 「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43年2月2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選定的軍官9人為徐人雋、宋哲生、江海東、文宗萬、葛正道、丁我揚、李搏鵬、金克明、趙煥庭。

所需船艦等，並分電駐日、韓兩大使館，遵照處理。⁵³ 因聯軍統帥部設在東京，關於接運留韓反共義士的問題，要在聯軍統帥部先決定，然後由他們轉告駐韓美軍辦理。⁵⁴ 8 日，接運聯絡組離開臺北轉赴東京，次日，在中華民國駐日大使董顯光的協助下，聯絡組曾分別拜訪聯軍統帥赫爾上將、聯軍統帥部高級幕僚、美遠東空軍司令魏蘭（Weyland）上將、海軍司令布萊斯寇（Briscole）中將商討有關接運義士之政策性問題。與赫爾上將會談時，赫爾表示原則上同意釋放義士後，所有運輸、補給、醫藥及安全措施，由美方負責，且美國之政策業已決定，會如期釋放反共義士，以減少共方之藉口，有助於政治問題之解決。當天下午，與聯軍統帥部有關幕僚舉行聯席會議，我方決定：一、反共義士獲釋後，由接運聯絡組代表中華民國，在仁川舉行儀式上點名接收，但技術上之正式接收則在基隆。二、由中華民國政府續派官兵 101 人、譯員 45 人，早期前往韓國協助隨船接運回國工作。三、因為安全及天象因素選擇在基隆登陸，每日上岸人數訂為 5,000 人。⁵⁵ 美方同意：一、安全方面，派驅逐艦海上巡邏，另派飛機空中警戒，登陸艇上派陸戰隊一排擔任船上警戒。二、服裝問題，除身穿大衣等物之外，每人軍毯 2 條。三、支援全部有關醫療、緊急事故等事項。⁵⁶

政策性之問題全部解決後，1 月 12 日，美派機將接運聯絡組送往漢城，與實際負責人美第八軍軍長泰勒將軍及各執行單位，商討有關接運義士之技術性問題。⁵⁷ 賴名湯與美第八軍參謀長謝邦及有關人員商談，假如北韓與中共發動搶俘之因應計畫；反共義士離開戰俘營時車輛的準備、車隊的編組、行程的排

⁵³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頁 29。

⁵⁴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58。

⁵⁵ 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臺北：軍友報，民國 44 年 8 月），頁 31-32。

⁵⁶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59；「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 43 年 2 月 2 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第一次報告」（民國 43 年 1 月 15 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800030039-76。

⁵⁷ 「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 43 年 2 月 2 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聯軍統帥部雖授權第八軍負責釋俘工作，但真正的執行單位，為在第八軍下之美第一兵團及駐韓後勤司令，前者負責警衛及秩序之維持，並預防戰事之再起與南韓軍之滋事；後者負責運輸、補給及醫務等問題，並特設歐遜特遣部隊（Task Force Olson）專門負責義士釋放後之一切陸運事宜。

定、指揮、道路警戒與通信問題的解決；到達仁川之前的休息地點、人數清理；上船後的組織、啓航後海上護航與空中掩護等問題，美軍同意其意見，並立即分工進行有關作業。一切計畫策定後，泰勒將軍召開一項聯軍釋俘會議，泰勒代表聯合國主持會議，向中華民國提出釋俘計畫綱要及預備計畫，賴名湯代表中華民國表示同意，韓國參謀總長亦無異議。⁵⁸ 此後，接運組人員分別留駐各地，積極展開聯絡工作，賴名湯與江海東等人，仍駐美軍第八軍總部大樓辦公，以便經常和泰勒將軍等高級首長，保持密切聯繫。賴名湯拜訪了實際負責執行釋放反共義士並負有預防突發戰事之責任的美第八軍第一兵團司令勃雷恩少將，及負責運輸補給及醫護等責任之美駐韓後勤司令勞頓少將。⁵⁹ 1 月 13 日賴名湯分別再拜訪南韓國防部長孫元一、外交部長卞榮泰，16 日謁見李承晚大總統，李認為戰俘的釋放無大問題。⁶⁰

於是開始按照計畫執行釋俘行動，美國為主要執行者。反共義士離開印度村（或稱義士村、印度營）後，沿途一切運輸、掩護、應變、安全等措施，由美軍一位旅長洛遜上校（Col. Lomson）指揮，全部作業所包括細節，叫做洛遜計畫。依據這項計畫，運送反共義士的卡車達 560 輛。其他的裝備、飲食、醫療、船舶調動等後勤工作，則由聯軍後勤司令部負責。美國海軍第七艦隊與空軍第五航空隊，擔任海上運輸安全掩護。⁶¹

接運聯絡組的主要工作，包括對盟總交涉運輸、補給、醫務、警衛及安全措施外，也對不願來臺及暴動分子作預防措施，擬定萬一釋放發生變化，南韓採取非常手段釋放時的緊急接運計畫。賴名湯為實地察看反共義士出營後路線，參加盟軍輸送演習。

中華民國應聯軍統帥部請求，另派輔導官兵 81 名及譯員 45 名，共 126 人，由王昇上校率領，於 1 月 15 日飛抵漢城，其工作分配為軍官 61 員全部派往汶山里在印度村外義士乘車站迎接及輔導義士登車，並隨同義士乘船返臺。譯員

⁵⁸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60-162。

⁵⁹ 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頁 32-33。

⁶⁰ 「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 43 年 2 月 2 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

⁶¹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62。

以 8 人在愛斯康城營帳內擔任登記工作，以 16 人在仁川港負責點驗簽收，以 6 人隨同傷病義士乘機返臺。其餘譯員及士兵分別配合加入工作。⁶²

待準備工作完成後就是實施接運計畫。1 月 19 日下午 3 時，賴名湯接獲泰勒將軍電話：「印軍已正式決定於 20 日上午 9 時交還戰俘，聯軍統帥部已準備接收，並按照原計畫運臺。」賴名湯當即電呈國內是項決定，連夜赴汶山里，準備迎接義士，並派接運聯絡組人員分赴各接待地區，協助美軍及配合中華民國的輔導官兵工作。

華籍羈留韓國反共義士於 1 月 20 日上午 8 時 52 分開始撤離印度村，分 30 車隊（每車隊除引導警衛預備車輛外，有卡車 16 輛，每輛載運義士約 30 人）運送至愛斯康城，至 21 日晨 2 時 45 分全部撤離完畢。在愛城，義士們下車辦理登記，換發服裝，消毒及用餐，然後復乘原車駛赴仁川港口。21 日晨，第一批為第 1 至 10 車隊共 4,686 人，於 8 時零 5 分啓航；第二批為第 11 至 20 車隊共 4,517 人，於 9 時 50 分啓航；第三批為第 21 至第 30 車隊共 4,875 人，於 21 日下午 5 時 45 分啓航，義士 14,078 人分三批各乘 5 艘，共 15 艘中字號登陸艇，在美艦飛機的護衛下直駛臺灣基隆港。⁶³（參見文末附圖）另外尚有部分傷病義士 143 人，不能坐船，除 1 人病重死亡，餘則商請美國派遣軍用機 6 架，於 23 日 8 時 30 分由漢城起飛，下午抵達臺北松山機場。以上船運及航運義士總人數共為 14,220 人。⁶⁴

接運聯絡組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在韓國接收反共義士的工作，初步點交是在仁川港碼頭附近 16 個帳幕中舉行，聯軍將每一車隊之 16 輛車運抵仁川港後，

⁶²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63；「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 43 年 2 月 2 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

⁶³ 〈義士總數〉《新生報》，民國 43 年 1 月 28 日版—記載到達人數第 1 批 4,684 人，第 2 批 4,497 人，第 3 批 4,886 人，與此有所出入。

⁶⁴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頁 163-165；「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 43 年 2 月 2 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頁 33-34；〈在美艦飛機護衛下義士昨全部啟航〉（民國 43 年 1 月 22 日），《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版 1。訪談錄與小組報告有出入時，以小組報告為主要依據。

即分別進入預設的帳幕中，由聯軍與中華民國軍官會同逐一點名交接，然後雙方簽署接收。正式簽署接收儀式，於1月23日下午4時在第八軍團總部舉行。由聯軍統帥代表第八軍團司令泰勒上將，將14,220名已取得平民身分之華籍反共義士移交中華民國政府。泰勒上將與中華民國代表賴名湯少將，簽字於官方文書上。另一儀式，將8千名韓籍反共義士移交大韓民國政府，由韓國參謀總長白善樺上將，代表韓國接收。因此大家熟知的「一二三自由日」，即是義士們恢復他們的平民身分，由聯軍總部與中華民國辦理交接反共義士的日子，⁶⁵並不是義士們來臺的日子。次日下午6時，接運聯絡組任務完成，乘機返臺覆命。⁶⁶

反共義士的來臺，是一件大事，尤其對韓境的華僑而言更是，因為在中共向南韓侵略進攻的時候，韓境的華僑大多被韓人仇視，當反共義士奮鬥成功得以勝利返臺，在他們看來是揚眉吐氣的事，因此幾乎大部分的韓國華僑及華僑代表，都趕到愛斯康城和仁川，歡送反共義士，慶賀他們的回臺。返抵國門後，臺灣各界同胞則熱烈地迎接他們的到來。⁶⁷

順利地接運反共義士來臺後，關於義士總人數究竟多少？過去的研究中並未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根據不同檔案資料來源，不同的統計時間，可找出不同的解答。例如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與「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同，謂：「1952年7月當時聯軍計有共方戰俘169,699人，其中約21,000人屬於中華民國國籍。」⁶⁸「民國43年（1954年）1月23日，……此14,220名義士已恢復其自由之身。」⁶⁸；1954年1月28日《新生報》根據聯勤總部基隆港運輸司令部發表之初步統計，來臺反共義士總數為14,067人⁶⁹；1954年6月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稱，「（民

⁶⁵ 「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43年2月2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43年1至6月份）（臺北：國史館，民國77年10月出版），頁196-200。

⁶⁶ 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頁35。

⁶⁷ 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頁34、154。

⁶⁸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頁2、29。

⁶⁹ 14,067人此數字是除了1953年10月8日突營歸來義士63人，1954年1月23日傷患義士142人外，25日來臺義士4,684人，26日4,497人，27日4,886人的總合。

國 43 年) 2 月初舉行義士人數總清查, 計當時實數為 14,335 人, 其後尚有陸續來臺義士, 合併計之全部反共義士實為 14,342 人。」⁷⁰ 根據臺北榮家家史室統計圖的統計, 回到臺灣義士總數更多, 為 14,715 人。本文則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為主要依據。(參見文末附表)

伍、義士的安置

接運來臺後, 反共義士的安置方面, 中華民國行政院安排是, 1954 年 1 月 3 日令國防部設置「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及「行政院反共義士就業輔導審議小組」來處理。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依據章程隸屬於行政院, 專門辦理反共義士由韓接運來臺、編組、管理、教育及輔導就業等事宜, 設處長一人, 由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兼任。⁷¹ 行政院反共義士就業輔導審議小組係由行政院院長陳誠任召集人, 以行政院、國防部、臺灣省政府各有關主管及民間團體領袖人士為委員, 審議小組之職掌為審議決定有關反共義士歸國財力、物力, 以及就業輔導處所請解決之各項問題。⁷² 10 日, 國防部令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蔣堅忍、北部防守區中將副司令高魁元分別兼任輔導處副處長, 並成立「反共義士就業輔導總隊」, 由高魁元兼任總隊長, 以中部防守區少將參謀長汪錫鈞兼任副總隊長。⁷³

1 月 25 日至 27 日共 3 日, 全部反共義士分三批先後抵達基隆港。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先曾派遣接運小組, 赴韓照料義士, 並在基隆港設置指揮所, 辦理有關義士接待及內陸運輸事宜。每批義士下船後, 均於碼頭附近出席各界之歡迎大會, 情況至為熱烈。⁷⁴ 當全部義士分批登陸後, 除其中一部分乘汽車遊

參見〈義士總數〉,《新生報》,民國 43 年 1 月 28 日,版 1。

⁷⁰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7。

⁷¹ 「行政院令」(民國 43 年 1 月 3 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700100144。

⁷² 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頁 176。

⁷³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357。

⁷⁴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36。

行基隆、臺北兩市，其餘人數則由鐵路銜接運送，抵達大湖、下湖、楊梅三處的義士村。⁷⁵ 進入義士村後，即由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與輔導處各單位慰問日程，首先前往慰問的，是中央委員會的慰問團，由秘書長張其昀率領常務委員及各單位主管與工作同仁代表等 60 人，攜帶大批書籍刊物，贈送義士。婦聯會由皮以書總幹事率領，至義士村慰問。但其中規模最大的慰問，是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 31 個常務委員單位負責人所組織的慰問團了。⁷⁶

國防部於 1 月 5 日籌組成立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該處秉承審議小組之決定積極反共義士歸國後之各有關事項。2 月 6 日，首批歸國的 63 位義士，經青年服務團 3 個月的講習期滿後 4 天，於是日經參謀總長核准，向陸軍總部報到，正式編入國軍部隊。⁷⁷ 8 日起，全體反共義士分別在大湖、下湖、楊梅三地 4 個教育區，開始接受為期 3 個月的就業輔導教育。義士所受的就業輔導教育，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精神教育，著重於灌輸民主政治，藉以恢復其個人尊嚴與自由思想，第二、第三階段，則按義士的教育程度，施以就業技術教育。⁷⁸

2 月 19 日，另有 7 位義士自漢城搭乘美軍用專機來臺，當晚，他們被安置在楊梅義士村。這 7 位義士是被中共指為犯有謀殺嫌疑，而被印軍扣留的義士，經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的抗議，和聯軍總帥部的交涉下，終於在 18 日獲釋的義士們。⁷⁹ 21 日，尚有 3 位義士，即與首批抵臺 63 名義士同時脫離聯軍俘虜營的義士們，由韓搭利來輪抵高雄，3 義士在高雄也受到南部民眾的熱烈歡迎。⁸⁰

經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於 1954 年 2 月初的調查，全部反共義士的籍貫分布全國 46 省市，以四川最多，達 4,449 人，新疆、蒙古、合江三地最少，僅各 1 人。年齡在 20 歲以上 30 歲以下者達 67.5%，31 歲至 40 歲者達 29.1%，其餘

⁷⁵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37；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頁 212、234、242。

⁷⁶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30-31。

⁷⁷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35。

⁷⁸ 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頁 176、319。

⁷⁹ 周琇環編，〈駐韓大使館電〉，《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臺北：國史館，國 95 年 10 月），頁 357。

⁸⁰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34-35。

則為 40 歲以上者，其平均年齡為 27 歲強。義士的教育程度，文盲占 43%、小學占 50%、中學占 6%、大專僅 12 人。義士原來職業，以軍人為最多，農人次之，工商學最少，軍人中原充國軍官兵者達 9,234 人，占義士總人數 66%，至義士參加匪軍時間在 3 年以下者占 85%，在 10 年以上者僅 2 人。⁸¹

這些調查統計，就籍貫來說，四川人最多占 45%，山東居次占 9%，來自東北各省者不多，是中共必須以華中、華南及南部兵源用於韓國，至於東北兵源則轉用於越南，藉以減少逃亡現象。義士的年齡，固然以 20 至 30 歲者占大多數，但 40 歲以上和不足 20 歲者仍占可觀數量，顯示中共兵源已經出現枯竭現象。義士的出身，絕大多數是中共的士兵，這些士兵又多是來自農村的國軍舊部，而農民在共產制度下，不但未翻身且是被驅往戰場作炮灰的主要對象。⁸²

根據義士身分統計，過去曾參加中共黨團組織的反共義士，計 3,948 人，為澄清義士陣容，消除疑忌，並擴大政治影響起見，經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督飭各級輔導人員醞釀，發動脫離中共黨團宣誓運動，遂引起義士們紛紛請求辦理，其過去意圖隱匿未辦理登記者，亦自動請求補辦登記。3 月 8 日，分別在大湖、楊梅兩地義士村舉行「脫離共產匪黨匪團組織宣誓典禮」，中央派反共義士後援會總幹事谷正綱監誓，綜計辦理脫離中共黨團組織者共 4,410 人。較過去登記者增加 462 人。嗣復策動匪諜自首運動，計自首者達 609 人，除 15 人情節較重移送感訓外，均經分別註記資料，交由接編單位繼續考查。⁸³

隨後，輔導幹部又策動義士從軍運動，3 月底，各支隊分別舉行請纓大會，普遍展開從軍運動，4 月 5 日舉行從軍宣誓典禮，中央派國防部參謀總長周至柔上將監誓並代表接受義士請纓書，影響所及，使全體義士（除老弱機障，分別予以安置養老，或者轉業經商，參加農墾之外）自 11 日起，准許義士經過體格檢查合格後，分別加入國軍部隊，從軍人數比例高達 97.4%。⁸⁴ 屬於士官

⁸¹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7。

⁸² 〈關於義士們的幾件事〉，《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4 日，版 2。

⁸³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1-42；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頁 691。

⁸⁴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

以下的約 9 千餘人於 4 月下旬，分發陸海空軍，照原階級安置服役，剩下的 4 千餘校尉級軍官，依照他們自己請纓報國的志願，經國防部令，仿照國軍原有的軍官戰鬥團，編為「反共義士戰鬥團」，以汪錫鈞少將為該團團長，由國防部總政治部直接指揮。至 1957 年春，反共義士戰鬥團擴編為兩個總隊，一為心戰總隊，一為特種作戰總隊，至此，完全與中華民國國軍融合成為一體。⁸⁵

義士在接受輔導教育期間，曾發起上述的脫離共黨運動、從軍報國運動外，為使國內軍民明瞭中共情勢，並答謝各界之盛意，選派代表組國內訪問團十組，深入各地訪問；為擴大國際反共宣傳，復有 4 組國際訪問團組成，分別訪問日本、菲律賓、泰國、越南等亞洲國家。⁸⁶

至於該處的經費來源，係分別由美援相對基金與國家預算支付，前者經美安全分署正式通過之數額為 8,357,300 元，後者由行政院核定總額為 13,066,0165.84 元，另收各界致送義士慰問金 1,421,675.13 元。5 月 20 日，反共義士的就業輔導教育並分撥各部隊（其從軍人數比例高達 97.4%）工作完成，於是在是日結束業務。結束業務後，所有工作人員分別歸建，檔案文卷則移交總政治部接管。⁸⁷

陸、自由日運動與義士來臺的影響

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於 1953 年 12 月 7 日會議，決遵照中央指示，為擴大爭取留韓反共義士如期獲釋，將於解釋期滿（23 日）後發動「自由日運動」。⁸⁸ 23 日，各界援助義士委員會於臺北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一致決議，定 1954

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2；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頁 827；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頁 170；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頁 36。

⁸⁵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358-359。

⁸⁶ 〈反共義士就業輔導概況〉，《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4 月 18 日，版 3。

⁸⁷ 「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 43 年 6 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900090042-50。

⁸⁸ 周琇環編，〈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發起反共義士「自由日」運動計畫草案〉，《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頁 459-462。

年 1 月 23 日為反共義士自由日。⁸⁹ 谷正綱任大會主席，委員有莫德惠等 500 餘人出席，谷正綱陳述支援反共義士獲得自由之兩項主張及三大步驟。兩項主張是：一、戰俘解釋工作，應在今日終止；二、戰俘監管工作應在 1954 年 1 月 22 日終止，並即釋放全體戰俘，使其恢復平民身分。三大步驟為：一、以援助反共義士恢復自由運動，呼籲國內外一致支持此一運動；二、以自由日運動，發動並團結世界正義力量；三、以自由日運動加強團結現在留於中立區之中韓反共義士，並聯合其反共自由力量，共同奮鬥。

大會並通過決議：一、特定 1954 年 1 月 23 日為反共義士自由日，並發表自由日運動宣言；二、發動各界熱烈響應自由日運動；三、由大會通電全世界各宗教團體，籲請全力支持；四、請自由中國文化教育學術界擴大響應；五、積極發動海外僑胞展開自由日運動；六、以大會名義，向聯合國、聯軍統帥、中立國遣返委員會、美國參眾兩院轉全美人民、大韓民國國會轉全韓人民等通電，藉擴大聲援反共義士，並致電慰問義士。⁹⁰ 此會議即反共義士自由日運動大會，籲請全世界民主國各團體，一致響應支援中韩反共義士，於 1954 年 1 月 23 日獲得自由，恢復平民身分，依其自願歸宿地區，分別予以遣返。

中立遣俘委員會依期釋放中韩反共戰俘一事，不論對共方或自由國家言，都是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對於自由國家言此事件意味著：對韓國問題之處理，第一步獲得了預期的勝利，正如中華民國行政院陳誠院長所指出之「中韩反共義士，恢復自由，不僅是中韩兩國反共鬥爭中的一大勝利，也是整個世界反侵略、反奴役鬥爭中的一大勝利。」⁹¹

對共黨國家言，這一事件意味著：一、共黨國家受莫斯科最高政策之決定，不願在韓境再戰爭，是馬倫可夫企圖採取緩進政策，以鬆弛冷戰局面為他們當時的急務，相對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以瓦解西方國家的反蘇作戰部署。二、共黨國家願意結束韓戰，是他們不能擴大戰爭的證明。韓戰停止，可獲得暫時性的或局部的和平，亞洲的戰爭危機也就平緩下來。⁹² 三、共產集權政制將不

⁸⁹ 〈全國各界一致聲援，爭取義士自由〉，《中央日報》，民國 42 年 12 月 24 日，版 1。

⁹⁰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185-186。

⁹¹ 易玲，〈從釋俘看亞洲大勢〉，《華僑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5 日，版 3。

⁹² 易玲，〈從釋俘看亞洲大勢〉，《華僑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5 日，版 3。

能確信可以統制其人民，因其人民已知在自由世界，可以尋得自由。心理戰專家相信蘇俄如再發動戰爭，或利用其附庸作炮灰時，必須再三考慮，可能現在有一大部附庸軍隊，或俄國軍隊將要逃亡，因渠已知不致於被強迫遣返回國。⁹³

對民主國家的啓示是，眼見共黨國家億兆人民，在共軍層層監視，機鎗密布環境下，除了屈服、自殺之外，並無法反抗，現有 1 萬 4 千名義士在韓國戰場，以「不自由，毋寧死」的奮鬥，爭取人性尊嚴，使民主國家人士，知所警惕，更為共黨國家的不自由民眾帶來生機，算是一件震古鑠今的行動。⁹⁴

而義士回臺，就對中華民國政府的重要意義又可由軍事上、外交上來看。軍事上其重要性，就數量上言，如第五節的討論，1 萬 4 千餘名反共義士中後來投效軍旅的人數比例達 97.4%，屬於士官以下的約 9 千餘人，分發陸海空軍，照原階級安置服役，剩下的 4 千餘校尉級軍官，仿照國軍原有的軍官戰鬥團，編為反共義士戰鬥團，以汪錫鈞少將為該團團長。至 1957 年春，該團擴編為兩個總隊，一為心戰總隊，一為特種作戰總隊，為中華民國國軍增加新血輪，加強新兵力；就精神上言，一、所爭取來歸之義士，是對共軍的一場重大勝利，義士的選擇自由，可瓦解共軍的士氣，對中華民國的反攻大陸也是一股精神力量。二、在建立反共救國聯合戰線號召中，第一次與大陸反共人民聯合的具體表現，可有計劃擴大其在政略上的影響。三、義士歸來，同時無形中增進了臺灣對中共軍情的了解。⁹⁵ 四、臺灣十分重視反共義士的來歸，如行政院設立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負責主持其安置工作，美國在美援專款下，撥出經費，以安頓其生活，此一事實中華民國政府認為勢將加深大陸人民對共黨的離心運動。

就外交上其重要意義有：一、志願遣俘原則下，反共義士的來臺在國際法上建立起一新原則，有功於國際法的發展。志願遣俘原則乃在於實際戰鬥終止時，戰俘有權自由選定其願被遣往之地；交戰雙方均不能使用武力而阻撓或強

⁹³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頁 32-33，引自《紐約時報》，1954 年 1 月 21 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刊，1954 年 1 月 29 日。

⁹⁴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頁 317。

⁹⁵ 「對留韓反共志士來臺處理方案的意見」，〈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700060101；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頁 338-339。

使戰俘遣返至其所屬之國。因此，志願遣俘原則對國際法之保障人權觀念的立場，亦發生重大的影響。⁹⁶ 二、對劃分敵我界限，團結民主陣營，具有重要作用，使中華民國藉此爭取得盟友的諒解，並提高國際地位。⁹⁷ 全體三分之二的中共戰俘回歸中華民國，無異中華民國政府在與共黨政府間一場大勝利，此後出席聯大代表蔣廷黻在聯合國辯論時，阻止中共入會，屢屢引此事實作為鐵證。⁹⁸

韓戰反共義士爭取自由成功的這段史實，雖然意義深遠，但為防阻國際共黨侵略，乃至整個自由國家的團結一致，仍有待努力。本來建立亞洲國家反共聯盟，原係我們多年來努力的目標。不過，自從鎮海會議後菲律賓的離心，與其他亞洲國家對聯合反共的意見分歧，乃至韓國李承晚大統領的一再反對邀約日本參加反共陣營，以致亞洲各國家政府，迄無法一致行動，各國政府間的反共聯盟，亦無法成立。考其主因，還是美國政府未能堅決領導所致。⁹⁹

反共義士歸國之後，影響所及，有港澳方面出現的大陸難胞逃亡潮，以及歷年不斷逃向港澳，逃出邊區的難胞，有從各地脫離中共的外交官，有駕機先後來歸的義士；在大陸內部，有李一哲反共的大字報，有北平紛紛出現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報等。¹⁰⁰ 反共義士的行動，鼓舞了淪陷於鐵幕後的大陸民眾，並成為引導其選擇民主自由的先河。至 1979 年止，歷年來由天空、由海上、由各種不同途徑逃出鐵幕來到臺灣的義士，為數不下 17 萬人。¹⁰¹ 至 1987 年解嚴之後，隨著「反共國策」的調整，所謂的「反共義士」才逐漸地喪失其重要性。¹⁰²

⁹⁶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頁 33。

⁹⁷ 「對留韓反共志士來臺處理方案的意見」，〈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國防部檔案》，國防部藏，檔號：0001238700060101；易玲，〈從釋俘看亞洲大勢〉，《華僑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5 日），版 3。

⁹⁸ 王東原，〈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傳記文學》，第 52 卷 1 期（民國 77 年元月），頁 26。

⁹⁹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頁 359。

¹⁰⁰ 賴名湯，〈八億人心嚮往自由〉，《中央日報》，民國 68 年 1 月 23 日，版 11。

¹⁰¹ 〈自由必勝，暴政必亡〉，《中央日報》，民國 68 年 1 月 23 日，版 2。

¹⁰²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文集》，頁 664-666。

柒、結 語

反共義士在「一顆心回臺灣，一條命滅共匪」的志願下，經聯軍的支持、韓戰停戰協定簽訂等國際因素運作，加上中華民國政府，於暗地派遣中國國民黨中六組副主任陳建中，赴韓進行組織策反工作；於明處號召民間加入援助義士運動。這些因素都曾發揮重要的影響力，促成義士來臺的結果。

中華民國派遣黨工赴戰俘營，作策反行動的時機，是 1953 年 2 月艾森豪當選為美國總統之後，因其宣布終止「臺灣海峽中立化政策」，暗示鼓勵中華民國反攻大陸，開闢第二戰線，藉以迫使中共同意韓戰停戰。結果，3 月 5 日俄曾史達林去世，國際共黨，群龍無首，停戰呼聲甚囂塵上。是時，蔣中正總統在主持外交宣傳會報席上，討論韓戰停戰的利弊時，國策顧問邵毓麟提議妥為運用戰俘。結果，由陳建中負責此項工作。陳建中前往釜山的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館，成立指導小組，就近策動巨濟、濟州島戰俘營中傾向中華民國的戰俘，並透過華籍譯員，接觸指導反共戰俘，形成組織，進行策反。當時的譯員黃天才曾著《我在 38 度線的回憶》，就是記錄這段歷史。

政府在明處號召民間加入援助義士運動，也辦得轟轟烈烈。首先是救總決定援助反共義士。1953 年 6 月該會發起援助留韓反共義士運動。9 月由救總召開援助留韓反共義士運動的籌備會。26 日在臺北市中山堂舉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成立大會，該會發起各項援助義士行動之外，各界對義士援助活動亦如火如荼地展開，支持義士的來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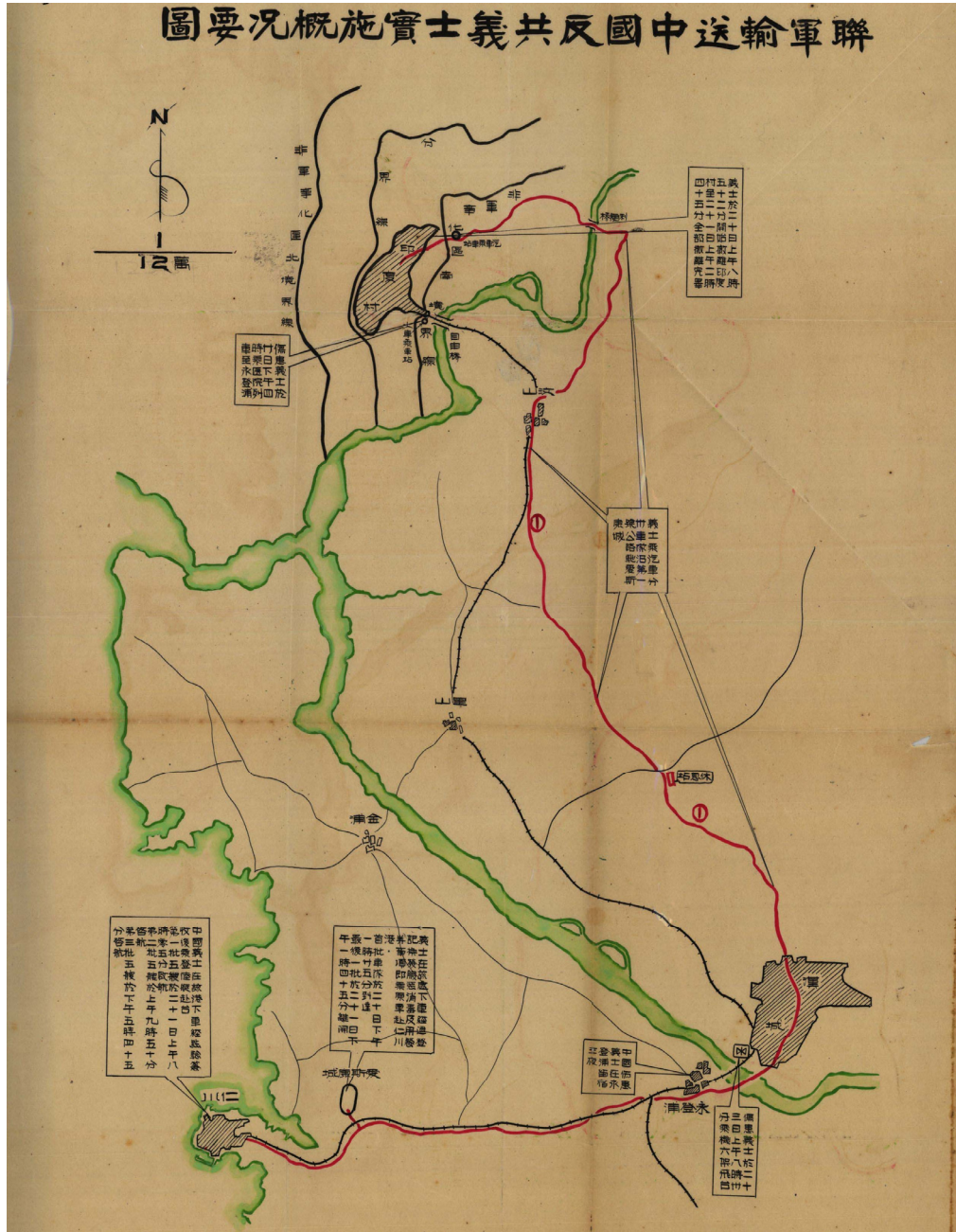
根據韓境停戰協定，韓戰交戰雙方同意將不願直接遣返回國的戰俘，交由 1953 年 9 月成立的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處理。至 12 月，終止解釋工作，同日，聯軍統帥赫爾上將宣布，運用一切方式，於 1954 年 1 月間使 1 萬 4 千餘名華籍反共義士送往臺灣。

透過美國執行的釋俘計畫，1954 年 1 月 20 日韓戰反共義士們開始啓行，23 日 142 名傷病義士抵達臺北，25-27 日 14,078 名反共義士抵達基隆。來臺後，由中華民國行政院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負責接運、編組、管理、教育及輔導就業等安置工作，結果除老弱機障，分別予以安置養老，或者轉業經商，參加農墾之外，全體義士分別加入國軍部隊，從軍人數比例高達 97.4%。義士的出身，

絕大多數是中共的士兵，這些士兵又多是來自農村的國軍舊部，而農民在共產制度下，不但未翻身且是被驅往戰場作炮灰的主要對象。

反共義士歸國之後，港澳方面出現了大陸難胞逃亡潮，後來歷年不斷有逃向港澳逃出邊區的難胞，有從各地脫離中共的外交官，也有駕機先後來歸的義士；在大陸內部，有李一哲反共的大字報，有北平紛紛出現要求民主自由的大字報等。可見，反共義士的行動，鼓舞了淪陷於鐵幕後的大陸民眾，成為引導其選擇民主自由的先河。至 1979 年止，歷年來由天空、由海上、由各種不同途徑逃出鐵幕來到臺灣的義士，為數不下 17 萬人。但至 1987 年中華民國政府解嚴之後，隨著反共國策的調整，「反共義士」逐漸地喪失其重要性。

附圖、聯軍輸送中國反共義士實施概況要圖



資料來源：〈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外交部檔案》，國史館藏，檔號：172-4/0316。

附表、義士來臺時間人數一覽表

日期	義士人數		備註	
	總計	小計	所搭乘交通工具	
1953.10.8	63 人	—	專機	突營歸來者
1954.1.23	142 人	—	專機	傷患
1954.1.25	4,684 人	869 人	276 號（登陸艇）	第一批
		962 人	281 號	
		898 人	555 號	
		981 人	623 號	
		974 人	535 號	
1954.1.26	4,497 人	816 人	491 號	第二批
		938 人	488 號	
		865 人	643 號	
		910 人	230 號	
		968 人	653 號	
1954.1.27	4,886 人	969 人	456 號	第三批
		1,012 人	600 號	
		949 人	572 號	
		964 人	590 號	
		992 人	616 號	三批共 14,067 人
以上共計	14,272 人 ⁽¹⁾			
1954.2.19	7 人		專機	被中共指為犯有謀殺罪嫌，印軍扣留，經交涉於 18 日獲釋者。
1954.2.21	3 人 ⁽²⁾		利來輪	突營歸來者
總計	14,282 人			

說明：1954 年 1 月 27 日以後，2 月 19 日來歸 7 人、同月 21 日又來 3 人，所以應有共 14,282 人。但根據「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統計，至 1954 年 2 月止，反共義士人數共 14,342 人。

資料來源：(1)根據〈義士總數〉，《新生報》，民國 43 年 1 月 28 日，版 1 資料統計而來。

(2)1954 年 2 月 19、21 日的來臺人數，係依據本文頁 141 註 78、79 而來。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臺北，外交部藏）

633.43/005，「宣慰韓戰反共戰俘參考資料」（42年8月15日），〈在韓中共俘虜〉。

《外交部條約司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172-3/1625-8，「外交部施政報告初稿」，〈工作計畫與報告〉（民國42年10月至43年1月）。

《外交部國際組織司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172-4/0316，「賴名湯呈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工作報告書」（民國43年2月2日），〈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報告〉。

《國防部檔案》（臺北，國防部藏）

0001238900090047，「蔣經國呈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工作總報告」（民國43年6月），〈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0001238700060103，「對留韓反共志士來臺處理方案的意見」，〈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0001238600030013，「推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運動工作綱要草案」，〈留韓反共士處理案〉。

0001238600090090，「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兩個月來工作概況」（民國42年11月25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0001238800030039-76，「接運留韓中國反共義士歸國聯絡小組第一次報告」（民國43年1月15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0001238700100144，「行政院令」（民國43年1月3日），〈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0001238700060101，「對留韓反共志士來臺處理方案的意見」，〈留韓反共義士處理案〉。

臺北榮家家史室統計圖。

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一）》。臺北：國史館，民國94年5月。

周琇環編，《戰後外交史料彙編——韓戰與反共義士篇（二）》。臺北：國史館，民國 95 年 10 月。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Service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FRUS), 1952-1954, Vol. XV. Korea, Part I.

二、期刊、論文

王東原，〈反共義士爭奪戰紀實〉，《傳記文學》，第 52 卷 1 期（民國 77 年 1 月）。

周琇環，〈韓戰期間志願遣俘原則之議定〉，《國史館館刊》，第 24 期（2010 年 6 月）。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從一個節日的演變看當代臺灣反共神話的興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 89 年。

沈幸儀，〈一萬四千個證人：韓戰時期「反共義士」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民國 97 年。

馬國正，〈反共、恐共、恐國——韓戰來臺志願軍戰俘問題之研究〉。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7 年 7 月。

三、報紙

〈由匪俘論制匪之道〉，《新生報》，民國 40 年 6 月 2 日，版 2。

〈投誠義士嚮往祖國〉，《新生報》，民國 40 年 7 月 3 日，版 3。

〈炒麵大禍不可收拾，『志願軍』志願投降〉，《新生報》，民國 40 年 7 月 16 日，版 2。

〈義士總數〉，《新生報》，民國 43 年 1 月 28 日，版 1。

〈遣返會昨決定終止解釋〉，《中央日報》，民國 42 年 12 月 24 日，版 1。

賴名湯，〈八億人心嚮往自由〉，《中央日報》，民國 68 年 1 月 23 日，版 11。

〈自由必勝，暴政必亡〉，《中央日報》，民國 68 年 1 月 23 日，版 2。

〈關於義士們的幾件事〉，《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4 日，版 2。

〈反共義士就業輔導概況〉，《中央日報》，民國 43 年 4 月 18 日，版 3。

〈全國各界一致聲援，爭取義士自由〉，《中央日報》，民國 42 年 12 月 24 日，版 1。

〈在美艦飛機護衛下義士昨全部啓航〉，《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

版》，民國 43 年 1 月 22 日，版 1。

易玲，〈從釋俘看亞洲大勢〉，《華僑日報》，民國 43 年 1 月 25 日，版 3。

四、回憶錄、紀念集、訪談錄

邵毓麟，《使韓回憶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0 年。

編輯委員會編，《彩繪人生八十年——陳建中先生八秩華誕文集》。臺北：日本研究雜誌社，民國 81 年 11 月。

賴啓訪問，《賴名湯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民國 83 年。

杜平，《在志願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1 年 2 月 2 刷。

五、專書

任念祖編，《中華民國史事紀要》（民國 43 年 1 至 6 月份）。臺北：國史館，民國 77 年 10 月。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反共義士》。臺北：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反共義士委員會印行，民國 43 年 1 月。

中華民國各界援助留韓中國反共義士委員會編，《援助反共義士歸國》。編者印，民國 43 年 5 月。

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編，《韓戰反共義士歸國紀實》。臺北：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民國 77 年 6 月。

江海東，《一萬四千個證人》。臺北：軍友報，民國 44 年 8 月。

反共義士奮鬥史編纂委員會編，《反共義士奮鬥史》。臺北：反共義士就業輔導處，民國 44 年元月初版。

外交部編，〈處理反共義士歸國之經過〉。臺北：外交部印行，民國 43 年 10 月 20 日。

徐焰，《毛澤東與抗美援朝戰爭》。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年。

國防大學戰史簡編編寫組，《中國人民志願軍戰史簡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9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刷。

Pingchao Zhu, *Americans and Chinese at the Korean War Cease-Fire Negotiations, 1950-1953*. NY: The Edwin Mellen Press, 2001.

Robert R. Simmons, *The Strained Alliance: Peking, Pyongyang, Moscow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Civil War*. NY: The Free Press, 1975.

六、網路資料

January 4, 1954 - Gen. John E. Hull, U.N. commander in Korea, stated that he would not accept any proposal aimed at keeping prisoners of war in neutral custody beyond Jan. 22, 1954. (source: The Britannica Archive)
<http://www.britannica.com/facts/10/40906074/January-4-1954-Gen-John-E-Hull-U-N>